

边缘缔造中心

历史视域中的上海与江南

周武 著

江南文化研究丛书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上海书店出版社



历史视域中的上海与江南

边缘缔造中心

周武 著

江南文化研究丛书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上海書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边缘缔造中心:历史视域中的上海与江南/周武著.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9.3

(江南文化研究丛书)

ISBN 978-7-5458-1789-8

I. ①边… II. ①周… III. ①文化史-华东地区-文集 IV. ①K29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044268 号

责任编辑 王 郡

封面设计 邨书径

边缘缔造中心

——历史视域中的上海与江南

周武 著

出 版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发 行 上海人民出版社发行中心
印 刷 苏州市越洋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7
版 次 2019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58-1789-8/K·338
定 价 58.00 元

自序

去年8月下旬，上海世纪出版集团阚宁辉兄邀我到朵云书院讲江南文化与上海现代出版的关系，活动结束后，宁辉兄谈起上海人民出版社正在策划一套江南文化研究丛书，邀我加盟，并委薛羽、王郡兄跟我联系、落实。于是就有了这本书。在此，当然先得谢谢宁辉兄的盛意。

历史视域中的上海与江南，是我一直比较关注的题目。二十多年前，我在写《上海通史·晚清社会卷》时就已发现，如果不了解江南，根本无法真正地、深入地、完整地了解上海城市的近代变迁；同样的，如果不了解上海，也不可能真正地、深入地、完整地了解江南区域的近代巨变。后来我把这个想法写成专文，题作“从江南的上海到上海的江南”，大意是，前近代上海作为一个区域性港市，虽已逐步显示出自己独特的城市个性，特别是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和雍正七年（1729年）相继解除“海禁”之后，上海城市社会经济构造的外向型特征尤其明显，展现出开放主义的态势，但无论在地理空间上还是在江南城市群中，上海都处于江南的边缘位置，其地位不但无法和苏州、杭州这样的中心城市相比，甚至亦不及当年府衙所在地松江。就整体而言，那个时候的上海，是江南的上海。开埠后“时局为之大变”，上海快速崛起，并取代江南传统的中心城市苏州和杭州，一跃而为江南新的中心城市和连接东西“两个世界”的枢纽之城。此后，上海便开始以中心口岸的力量重塑江南区域经济版图和文化版图，江南则逐渐变成上海广袤而又丰饶的腹地，江南的上海遂变成上海的江南。从江南的上海到上海的江南，这种变化，从表面上看，是江南地区城市格局在近代前后的“主从倒

置”，实则这种“主从倒置”背后包含着极为复杂、深广的社会历史内容，它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以苏杭为中心的江南，是埠际贸易主导的一个“区域性世界”，上海只是作为苏州的转运港而存在；以上海为中心的江南，则转变为对外贸易主导的，因而被深度卷入世界市场和全球体系之中的“世界性区域”。二者的格局大不相同，可以说，这种转变不单是江南区域史上最具有深远意义的转折，而且牵动中国由传统到现代的整体变迁，并促成现代中国的兴起。

本书即围绕上述思路展开，分上篇、下篇和附录三个部分。上篇四章主要讨论上海如何从江南边缘走向江南中心：第一章“从渔村到都会”，勾勒古代上海历史变迁的轨迹；第二章“城市转型”，论述开埠 170 多年来上海经历的三次重大转型；第三章“法租界”，主要结合近代上海“法国区”形成、衍变历史，揭示其不同于公共租界的市政制度和治理体系；第四章“上海文化的三重构造”，则着力展示 1949 年后革命文化与上海都市文化之间互动与消长，以及这种互动与消长对上海人生活世界和精神世界的深刻影响。下篇四章聚焦江南中心城市位移的具体过程及其引发的江南区域社会一系列异乎往古的变迁：第五章“近代‘兵事’与上海的崛起”，以太平军之役为中心，论述战争如何塑造上海；第六章“太平军战事与江南社会异变”，则重点讨论太平军战事在哪些方面给江南社会造成难以复原的异变；第七章“长江沿江城市近代化与城市型帮会的消长”，结合长江沿江城市近代化这个大背景，分析城市型帮会势力的起落变迁；第八章“从苏杭到上海”，讲述上海如何在开埠通商及周边地区“突发事变”的推动下快速走向繁荣，并取代苏杭成为江南新的中心城市的历史过程，以及这个过程给江南区域社会带来怎样的影响。附录六篇文章，前三篇为讲稿，后三篇为专访。这些讲稿或专访讨论的问题各异，但均与本书主题相关，可以视为正文的补充或延伸。

上海与江南，本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无法切割的点、线、面之间的关系，但长期以来上海史研究和江南史研究基本上是两拨人马，兵分两路，各守防地，这种状况近年来虽已有所改观，但如何在已有的上海史研究和江南史研究基础上，对江南区域近代以来的巨变做出更通贯整体的阐释，仍是一个艰巨的课题。本书只是个人的一点初步尝试，更深广的研究则有待学界的共同努力。

2019 年 3 月 21 日

目录

1	自序
上 编	
1	第一章 从渔村到都会：古代上海的历史变迁
3	第二章 城市转型：上海走向现代之路
25	第三章 法租界：近代上海的“法国区”
51	第四章 上海文化的三重构造
71	
下 编	
89	第五章 近代“兵事”与上海的崛起
91	第六章 太平军战事与江南社会异变
115	第七章 长江沿江城市近代化与城市型帮会的消长
132	第八章 从苏杭到上海：江南区域版图的重构
176	
附 录	
199	上海研究的现状与未来
201	——在日本兰心大戏院研究会的讲演
207	大上海的兴起
	——在建投读书会的讲演

- 225 历史视域中的上海与江南
——在东方讲堂的讲演
- 231 上海，一座“比虚构更神奇的”城市
——答《解放日报》记者夏斌
- 245 苏河湾：一个城区的毁灭与复兴
——答澎湃新闻网记者鲁怡
- 255 绘制更为通贯整体的学术地图
——答《学术月刊》编辑张洪彬

上 编

第一章 从渔村到都会：古代上海的历史变迁

上海研究如今已成为国际显学，每年都有大量的相关论著出版或发表，但多集中于开埠以后的上海城市变迁，较少涉及开埠以前的上海，以至于我们对上海建县以前的历史，上海城市的起源，或者说上海的“前世”，至今仍所知甚少。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需花大力气寻找古代上海历史变迁的轨迹。

一、水系

上海的起源跟苏州河有着莫大的关系，因此，讲述上海的历史变迁，不能不首先了解历史上的苏州河和苏州河的历史。

苏州河本名吴淞江，上海开埠后，英国商人发现乘船从这条河通过青浦县境内，一直上溯可以到达苏州，所以就叫它 Soochow Creek，即苏州河。此名的文字记载，始见于道光二十八年（1848 年）上海道与英国领事所订扩大租界的协定。此后，这一名称相沿成俗，一般以北新泾为界，以西上游河段仍称吴淞江，以东进入上海市区的下游河段叫苏州河。现在上海人则已将吴淞江流经上海的河段，均叫做苏州河。但中国官方资料和正式出版的上海地图，仍称吴淞江，或标作吴淞江（苏州河），直到改革开放以来这种状况才开始改变。苏州河这个称呼不仅喧腾于市民之口，而且出现于各种官方文献。

吴淞江之名最早见于《陈书·侯传》，在北宋时郑亶和郑乔父子的《水利书》

中，松江与吴淞江两名并用，元至元十五年（1278年）改华亭府为松江府后，始只称吴淞江。此前吴淞江通用的名称是它的古名松江。

松江，又称松陵江、笠泽江，曾经是一条横贯东西的通海大河。早在秦始皇称帝的时候，这条通海的水道就已是长江三角洲地区连接湖（太湖）海（东海）的航运要道。大约到了东汉时期，这条水道出现了两个名称：西段叫松江；下游东段称沪渎，南北朝《吴郡石像碑记》云：“吴郡娄县界，松江之下，号曰沪渎”。如此说来，沪渎可以说是苏州河最初的名称了。上海简称“沪”，即由此而来。

在古代文献中，松江与娄江、东江并称“三江”，东晋庾仲初《扬都赋》注云：“今太湖东注为松江，下七里有水口分流。东北入海为娄江，东南入海为东江，与松江而三也。”^[1]这就是说，太湖流域原有三条通海的河道，但由于从东南入海的东江和从东北入海的娄江在唐代即已湮塞，松江乃成为古代沟通太湖与大海的唯一干流。

太湖流域地势低洼，水网密布，五里一纵浦，十里一横塘。正因为如此，上海有关水的名称如江、河、浦、泾、沟、塘、港、浜、湖、淀、泽、荡、湾、汇等，一应俱全，这在全国可谓屈指可数。据北宋水利专家郑亶和郑乔父子的《水利书》记载，吴淞江南岸有大浦十八条，其名称分别是：小来浦、盘龙浦、朱市浦、松子浦、野奴浦、张整浦、许浦、鱼浦、上澳浦、丁湾浦、芦子浦、沪渎浦、钉钩浦、上海浦、下海浦、南及浦、江苕浦、烂泥浦。其他见之于方志和史书的小浦，不计其数，其中有一些地名一直沿用至今，如上海、三林、周浦、月浦、吴泾、江湾等等。

上海浦和下海浦分别处于吴淞江下游的上下段，历史上的上海聚落最初即兴起于上海浦岸上，上海即因上海浦而得名。上海浦起自今十六铺以东，北上抵今外白渡桥附近，朝东折向今浦东陆家嘴，再往北在今嘉兴路桥处入注吴淞江。当时，吴淞江已穿越今上海市区出海，而黄浦（近代始称“江”）仅流到今十六铺以东，上海浦恰好将两者贯通。及至明代，吴淞江下游壅塞，于是开浚旧河道引黄浦直接从吴淞口出海，并使吴淞江从今外白渡桥处汇入黄浦，形成现在的江浦格局。由于水系的变化，上海浦受到黄浦侵并，其名逐渐湮没。根据历史地理学家的研究成果，上海浦汇入开凿后的黄浦江，其位置相当于今黄浦江外滩至十六

[1] 转引自酈道元：《水经注》卷29，“污水”。

浦江段。下海浦呢？据有关学者考证，下海浦约在清乾隆年间被填没，据说故址在今虹口海门路一线，只剩下孤零零的下海庙，仿佛还在诉说着下海浦的历史。

作为太湖流域唯一的通海干流，松江上承太湖，蜿蜒而东，这些纵浦和横塘俱受其裹挟，东流入海。据称，松江沿江南岸有 96 条支流，北岸有 82 条支流，这些支流注入后，松江水势益壮，“深广可敌千浦”。在唐朝诗人李白的时代，江面最宽阔处达 20 里，后由于泥沙淤积，河道日渐变狭，但到北宋时仍有 9 里，可谓浩浩汤汤，一片浩淼。但松江河道弯曲，自古即有“五汇四十二弯”之说。“五汇”，指白鹤汇、安亭汇、顾浦汇、盘龙汇和河沙汇等五个大湾子；“四十二弯”，则指沿江四十二个小湾子。南宋《云间志》称：“松江东注，委蛇曲折，自白鹤汇极于盘龙浦，环曲而为汇不知其几。水行迂滞，不能径达于海。”特别是在下游河口段，由于太湖流域地体下沉，海岸线不断向东伸展，松江河道在新涨的沙涂上不断延展，不免沙泥俱下，再加上潮汐来去，更易造成淤塞和水患。于是，疏浚松江、治理水患，就成了朝廷和地方政府不能不面对的急务。

自北宋起，历代均以疏浚松江为地方要政，并采取了不少富有针对性的措施。鉴于松江河道委蛇曲折，易于淤塞，北宋时曾多次截弯取直。宝元元年（1038 年）截直介于华亭、昆山之间的盘龙汇弯道；嘉祐六年（1061 年）截直松江中游的白鹤汇；熙宁年间（1068 年—1077 年）又截直介于白鹤汇、盘龙汇之间的顾浦汇。三次截弯取直，不但使“吴中得免水患”，而且极大改善了吴淞江的航运条件，到元至元十四年（1277 年）海舟巨舰从吴淞江入海口向西行驶，仍可“直抵城东葑门（苏州）泊”。

截弯取直固然有助于提升吴淞江的排水泄洪能力，但并不能解决下游潮汐涨沙的壅积。而下游的淤塞，又会造成或加剧上游的水患。到了明代，吴淞江下游河段已缩至 40—50 米，有的河段甚至“仅如沟洫”。每逢江南豪雨，太湖流域水无所归，常常使沿江一带变成“泽国”。而太湖流域又是全国的赋税重地，攸关朝政，水患势必牵动国计民生。于是，疏浚吴淞江，依然是明清时期从中央到地方无法回避的严峻课题。据统计，明代约 17 年疏浚一次，清代约 22 年疏浚一次。其中与苏河湾关系最为密切的有三次：

一是明永乐元年（1403 年），太湖水患，户部尚书夏原吉衔命治理，采邑人叶宗人“以浦代淞”建议，征发 20 万民工以人力抗造化，疏浚范家浜，上引大黄埔、达泖湖之水入海，促成了以“浦”夺“淞”的河流改道。此后，黄浦江“喧宾夺

主”，江水滔滔入海，而吴淞江则缩为一条静静的支流，河水由西向东汇入黄浦江。

二是明正德十六年（1521年），巡抚都御史李充嗣奉命主持疏浚吴淞江，他亲率民工穿凿新渠“改入浦之道”，另行拓浚宋家港70余里河道，引吴淞江水在今潭子湾附近折东改道至宋家浜，经范家浜入海。吴淞江原河道成为与改道后的吴淞江并行的支流，改称旧江。吴语中“旧”“虬”同音，故亦称虬江。

三是明隆庆三年（1569年），巡抚都御史海瑞主持疏浚吴淞江下游河道，他采取的方法是借饥民之力，“按江故道，兴工挑浚”，历时一个半月，疏浚黄渡至宋家浜河道约80里，并拓宽延伸吴淞江“故道”约10里至今外白渡桥附近，直接纳入黄浦江形成淞浦会合口。

吴淞江原本是太湖流域的通海干流，北宋时从南阡浦口入海，后改从大阡浦口（后称吴淞口）注入长江口。经上述三次疏浚，黄浦江由吴淞江的支流变成干流，吴淞江则由干流变成黄浦江的支流。吴淞江下游改道宋家浜入黄浦江，这条新的河道，也就是今日苏州河的前身。此后，虽然吴淞江（苏州河）还经历过大大小小、不计其数的疏浚和整治，但由上述三次疏浚底定的上海水系格局再也没有改变过。

经过多次疏浚治理，黄浦终于成为一条浩浩淼淼的大河，逐渐取代吴淞江成为上海的水上大动脉。吴淞江与黄浦江发生主从倒置，黄浦江地位日益突显，《弘治上海县志》中称：“百余年来，人物之盛，财赋之伙，盖可当江北数郡，蔚然为东南名邑。”从此，上海城市的发展重心也转移到黄浦江沿岸。

附带需稍作说明的是，坊间所谓黄浦江系战国时春申君黄歇所凿，因而又称歇浦或春申江，上海因此而简称“申”，其实那是元以后的无聊文人从黄字身上穿凿附会的结果，根本不足信。黄浦之名不见于汉唐时代任何文献，不见于北宋时专论三吴水利的郑宣、郑乔、单锬诸人的著作，也不见于南宋时的《绍熙云间志》，入元始见记载，只称黄浦，不称黄浦江。黄浦之逐渐成为太湖下游的泄水要道，从各种有关太湖流域水利的记载看来，是元代以后的事，跟春申君根本扯不上关系。

二、建置

据近年来上海考古学家的发掘研究发现，上海有人迹的历史距今大约有七千

年。但有文献佐证的历史却要晚得多，曾作《上海地区疆域沿革考》的上海史专家譙枢铭指出：上海地区的历史，由于历时久远，文献奇缺，“秦汉时代几不可考，隋唐时代也仅能沿地域范围寻踪索迹，窥其概略，宋元以下才有方志可据。”^[1]就连隋唐以前上海归属何郡何县，向来是众说纷纭，混沌不清。

上海已知最早的行政管理机构叫上海务，据清嘉庆年间徐松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宋代官修《宋会要辑稿·食货十九·酒曲杂录》记载：神宗熙宁十年（1077年）秀州所领十七处酒务中，上海务已位列其中。而据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考证，上海设立酒务应在宋天圣元年（1023年）以前。务系政府为征收酒税而设的专门机构，在上海设立酒务，显见至少到了宋代上海已是人烟繁盛的所在。而“从聚落的最初形成到发展到够资格设置酒务，又当有一段不太短的过程”，^[2]尽管现在仍无法确知这个聚落形成、发展的具体过程，但从唐宋文人墨客的歌咏中开始频繁出现沪渎两岸风物的记录，如静安寺、通济龙王庙、芦子城（即沪渎垒）、沸井浜、青龙塔等的歌咏，可见当初的许多风物和人情，如青龙镇成为对外航运港口，沪渎的水产集贸市场，南陆口与江湾新兴的盐场等，呈现出吴淞江下游的社会人文繁荣之景象。

另外，从至今尚存或遗迹尚存的风物庙宇，以及附着的故事，亦可获得一些佐证。上海市区现存的三大寺庙道观：静安寺、龙华寺和城隍庙，相传均设于上海设置酒务之前。静安寺，相传始建于三国吴大帝赤乌年间（238年—250年），初名沪渎重元寺，也称沪渎重玄寺，原址在吴淞江北岸（极可能位于今潭子湾一带，实地已经难以考证）。唐代重元寺更名为永泰禅院。北宋宋仁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改永泰禅院为静安寺，沿用至今。南宋宁宗嘉定九年（1216年），寺僧仲依因寺的基础被江水冲汇，“有倾圯之虞”，乃迁于现址。据光绪《重修静安寺记》碑云：“沪渎迤西行四五里，蔚然环村落间者，曰芦浦，有古丛林居僧焉，则静安寺也。”可见南宋时代静安寺的状貌。龙华寺，始建于吴大帝赤乌五年（242年），有康僧会立茅弘法，龙华塔则始建于赤乌十年（247年），千余年来，寺与塔屡圯屡建，有宋一代，历代帝王，不断赐帑赐田，可见龙华寺已经有很大规模。元灭宋，龙华寺也未遭破坏，元末，龙华寺被毁，惟龙华塔独存。龙

[1] 譙枢铭：《上海地区疆域沿革考》，见《上海史研究》，学林出版社1984年版，第1页。

[2] 谭其骧：《上海得名和建镇的年代问题》，《文汇报》1962年6月21日。

华寺自古为弥勒菩萨道场。五代时，已经形成自然村落龙华村，元代龙华街市初具规模，明代龙华寺已成繁华市镇，诗人每以“龙华晨钟”“龙华午泊”“龙华夜泊”为题，赋诗记述其繁华。无论是静安寺还是龙华寺，就设在吴淞江支流上海浦的岸边。民俗学中谓“民间信仰”一般是指信仰并崇拜某种或某些超自然力量，一般都以万物有灵为基础，以鬼神信仰为主体，以祈福攘灾等现实利益为基本诉求，自发在民间流传的一种非制度化、非组织化的一种信仰存在，倘若那个时代上海只是孤悬海边的一个“小渔村”，别说它无法承载，甚至完全托不起这，也无法解释这三大古刹与道观兴旺的香火。

正是基于上海社会经济的发展，到了宋末，上海建镇，并设立市舶司。镇是县以下的一种地方行政机构，设监官掌巡逻盗窃及火禁之事；市舶则只设在为数不多的沿海州、县或镇，掌海上贸易。

上海务、上海镇和上海市舶司在宋代的相继设立，说明上海到了宋代社会经济已有长足的推进。如果上海的酒业不发达，酒坊、酒窖、酒库、酒肆零落，朝廷就不可能在这里设立酒务，对酤酒产业进行控制；如果上海只是一个普通的聚落，商业没有发展到一定程度，也不可能升格为镇；如果上海的海上贸易没有发展到一定的规模，朝廷不可能将市舶司设在这里。务、镇、市舶司的设置均以社会经济的发展为前提。宋史专家王曾瑜在《宋代的上海》一文中说：“总的看来，上海在北宋时，仅设酒务，直到南宋后期，大约增设了市舶分司、巡检司和商税务……元初很快在上海设市舶司，作为海运粮站，并且破格升县。上述行政地位的变迁，正是上海有优越的地理位置，加之人口繁衍、经济和贸易兴旺发达的结果。”^{〔1〕}至宋元之际，上海已有巨镇之称，镇上有市舶司，有榷场，有酒库，有驻军，有官署儒塾、佛宫仙馆，商铺林立，鳞次栉比，成为华亭县东北一巨镇。元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松江府知府仆散翰文以华亭县地大户多，民物繁庶难理为由，向朝廷提议析置上海县。次年，朝廷批准了这个建议，析华亭县东北的长人、高昌、北亭、新江、海隅五乡地置上海县，县治就设在宋代上海务所在地。

上海县的设立，标志着上海从许多普通江南市镇中脱颖而出，成为县级政治中心之一。上海也从一个普通的小镇，上升为一个县级规模的政区。这是古代上海逐渐发展、累积的结果，也是上海成为一个城市的开端。

〔1〕 王曾瑜：《宋代的上海》，《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1期。

三、都会

清嘉庆《上海县志》中有这样一段话摹写当时的上海：“闽、广、辽、沈之货，鳞萃羽集，远及西洋暹罗之舟，岁亦间至，地大物博，号称繁剧，诚江海之通津，东南之都会”。^[1]这句话未免有些夸张，但也并不是空穴来风。经过宋元明清数百年的发展，到嘉庆年间，上海已是一座相当繁庶的县城。“沿浦闹市，北至洋泾浜口，南至薛家浜口，商旅猬集。沙船航海之业，有朱姓及郁姓、王姓、孙姓等富豪，世宗大族，有曹、陆、徐、乔诸氏”。^[2]县城内有街巷 63 条，^[3]城内及附近居民 20 余万，^[4]钱庄几十家，商肆店铺鳞次栉比，县城傍浦的大小东门外近廓之处更是热闹繁华。“言居民，则五方杂处，行帮汇集；言通商，则四处辐辏，水陆毕陈”，乾隆中叶以后，“上海县城已完完全全成为当时上海地区的经济中心所在”，^[5]远非昔日的滨海渔村可比了。

开埠之前的上海确乎已是一个个性鲜明的城市，一个万商云集的东南港市和商业大埠。不仅在松江府所辖各县，即使在整个江南地区的县市中，上海的地位因海禁的开放而日益突出。《法华乡志》称：“上海一隅，本海疆瓯脱之地。有元之时，国家备海寇，始立县治于浦滨，斥卤方升，规模粗具。自明至让清之初，均无所表见。时市肆盛于南城，城之北，荒烟蔓草，青冢白杨，其农户烟村多散处于西、南二境。”^[6]就是说，在明清易代之交，上海虽已设县达数百年之久，但与周边其他县城相比，依然是一个“无所表见”的普通县城。清康熙二十四年

[1] 嘉庆《上海县志》“风俗”。

[2] 姚明辉：《上海租界的开辟》，《上海地方史资料》（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21 页。

[3] 这 63 条街巷为：康衢巷、新街巷、同仁里、黄家弄、赵家巷、顾家弄、俞家弄、谈家弄、马家弄、瞿家湾、唐家弄、梅家弄、彩衣巷、果子巷、新弄、宋家湾、仁巷里、东街、孙家弄、姚家弄、刘家弄、四牌楼街、天官坊街、豸狮弄、马园弄、安仁里、葛家弄、穿心街、吴家弄、计家弄、旧教场街、王医马弄、狮子弄、馆驿弄、薛弄、三牌楼街、北张家弄、太平街、杜家湾、淘沙场、石皮弄、中心弄、高家弄、康家弄、新路巷、艾家弄、白栅、南张家弄、梅溪弄、乔家栅、何家弄、白巷、钩玉弄、仓桥弄、卜家弄、观澜亭巷、篴竹弄、如意街、太平弄、行仁里、洋行街、三角地、北弄。

[4] 张仲礼主编：《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近代化》，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663 页。

[5] 张忠民：《上海：从开发走向开放》，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485 页。

[6] 李鸿嘉：《法华乡志·序》，见王钟编：《法华乡志》。

(1685年)解除海禁,设立海关,部分开放海区,准许海上贸易,上海才逐渐摆脱清初的“海禁严切,四民失调”的困境,走向复苏。雍正七年(1729年)海禁完全解除,海区大开,上海迎来一个大发展的机遇。随着国内外贸易的发展,上海在周边地区的地位日益突出。一个显著的例子是,当时在行政上仍隶属于松江府,但雍正以后,向驻太仓、苏州,比府衙更高一级的地方军政机关,苏松太兵备道衙门移驻上海,这无疑表明海禁解除后随着经济地位的提高,上海的政治地位也随之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作为一个象征,苏松太兵备道的移驻上海,说明上海已成为一个区域的政治中心。^[1]嘉道年间上海人曹晟在其所著《觉梦录》中称当时的上海县城“不更出于松城之上乎!自海禁既开,民生日盛,生计日繁,金山银穴,区区草县,名震天下”。^[2]这段话大体反映了开埠前夕上海政治、经济发展的实况及其在区域中的地位。

有关开埠前上海城市演进的情况,张忠民的《上海:从开发走向开放》、茅伯科和邹逸麟合著的《上海港:从青龙镇到外高桥》、吴贵芳的《古代上海述略》、陈杰的《实证上海史——考古学视野下的古代上海》等著作已有相当具体细致的描述,此处不赘。下面着重讨论开埠前上海的若干重要特质。

(一) 以港兴市

众所周知,上海是一个滨海临江的县城。开埠前上海的崛起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上海港的兴起,依赖于埠际贸易和海上贸易。上海从滨海渔村发展成为后来世界著名的东方大港,期间经历了数百年的沧桑之变,几度兴衰起落,无不与海上贸易息息相关。上海的崛起肇始于海上贸易的发展,上海的衰落亦起因于上海港的衰落。可以这么说,什么时候上海的港口贸易发展了,什么时候上海也就兴盛;什么时候上海的港口贸易萎缩了,什么时候上海也就衰落。有学者曾这样描述上海的发展与上海港之间的关系:“上海城市的兴起和发展与上海港的发展有着相互促进、相互依赖的密切的关系。上海是一个典型的港口城市,它的兴起肇始于海上贸易,以后的兴衰也取决于港口的兴衰。连同城市的扩展和布局

[1] 苏松太兵备道移驻上海后,亦称上海道,上海道台之名即由此而来。

[2] 曹晟:《觉梦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98页。